

中国近现代 漫画新闻史

（下）

胡正强 著



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 漫画新闻史

(下)

胡正强 著

 人民出版社

第六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漫画新闻（下）

20世纪30年代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漫画新闻家们对生活的关注，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在这一时期漫画新闻家们的创作视野异常广阔，他们的笔触几乎伸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通讯漫画”的出现，就是漫画与新闻有机结合的产物，它反映出漫画艺术家在急剧变动的时代面前，走出艺术象牙之塔，运用和发挥自己的专业长才，去主动影响时代的变化，干预生活的发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走上了历史的舞台，红色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出现使这一时期漫画新闻的创作也出现了新的格局和面貌，虽然由于艺术积累的不足和专业人才的缺乏，红军的漫画新闻在艺术表现上还显得较为粗糙、稚嫩，但富有生命活力的成长态势，已经显示出它必将拥有一个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极为美好的非凡前景。

第一节 《漫画生活》的漫画新闻

生活永远是漫画新闻创作的源泉。1934年9月15日，一群进步美术工作者在中国现代漫画的发祥地上海，以日常生活般“朴实的姿态”^①创办了《漫画生活》杂志。这是一本在反映生活的深度方面被认为可以与《时代漫画》及其稍后的《中国漫画》鼎足而三的重要漫画新闻刊物。《漫画生活》由金有成、俞象贤创办，吴朗西、黄士英、黄鼎、张谔、钟山隐等人主持具体编辑工作，由吴朗西主持的美术生活杂志社出版。该刊为16开本，从

^① 汪子美：《中国漫画之演进及展望》，《漫画生活》第13期，1935年9月20日。

1934年9月15日至1935年9月29日，共出13期。《漫画生活》不以美丽的趣味为卖点，而是以质朴的姿态，恳切朴实地暴露现实的丑恶，从国家大事到家长里短，从自在的街头风景到主观的内心苦乐，无不惟妙惟肖地予以呈现，如同一部那个年代的社会生活史。打开刊物的一刹那，强烈的时代氛围和丰富的生活场景扑面而来。所以该刊一问世，便获得了知识思想界的齐声喝彩。也正因此，《漫画生活》仅仅存在了一年，就被迫停刊。

▲《生活的呼号》（图6-1-1）。这则漫画新闻发表在1934年9月15日的《漫画生活》第1期上。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磨难。正如吴朗西在《漫画生活》第1期的《开场白》中所说的那样：

世界是一个大舞台。

人人都扮演悲喜剧的角色，人人又是悲喜剧的观众。舞台上的节目虽然天天在变更，但总走不出悲喜剧的范围。

我们且翻开今天的节目来看看：战乱，失业，灾荒，饥饿的大悲剧占据了这动乱时代的大舞台。

生长在这个时代的大众的生活实在是太悲惨了。然而在舞台的另一角却有少数在这火山口跳舞享乐的人们。

这样展开在我们眼前的世界是充满着何等矛盾。

不过我们相信这不调和的现象是应该消灭的，迟早是会消灭的。

现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刊物在这样的时代中产生了。它只是一只摄取时代舞台上悲喜剧的镜头；陈列在读者面前的作品，也就是上演过的悲喜剧一幕一幕的写真。表演的情节：矛盾也罢，愉快也罢，悲苦也罢，我们只知道忠实地摄取，敬待读者自己去玩味，去证实，去认清，去批评。这便是我们这小小刊物的小小希望。^①

^① 编者：《开场白》，《漫画生活》第1期，1934年9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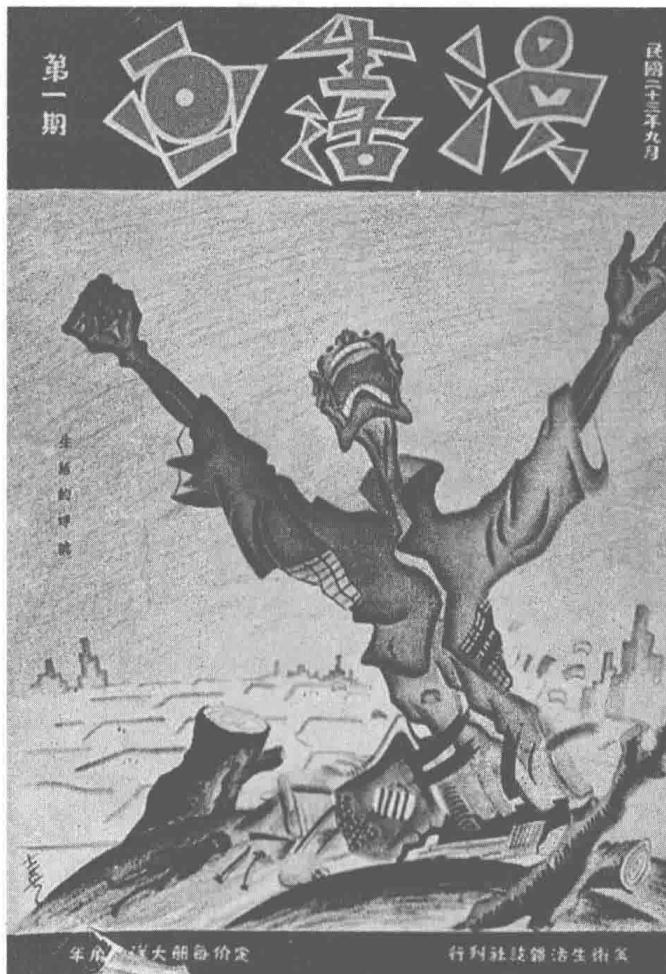


图 6-1-1 黄士英《生活的呼号》1934 年 9 月 15 日

刊物封面往往是编辑对刊物编辑方针的宣达，《生活的呼号》这则漫画新闻作为《漫画生活》第1期的封面漫画，渗透了刊物编辑对生活、对刊物社会功能的认识。这则漫画新闻的画面中，一位劳动者从一片废墟中钻出，昂首苍天，张开双臂，奋力呼号。劳动者形体的变形和夸张，使画面充满了力道，让人民感受到时代的沉闷、生活的沉重、个人的迷茫和追求的艰难，传达出刊物编辑对时代与生活本质的理解，透露出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对压迫者的谴责，对纸醉金迷生活的批判，对光明和希望的呼唤。虽然身处灰暗沉闷的社会环境之中，但在希望的指引下，仍不懈地呐喊与奋斗。漫画新闻把

对生活本质的抽象理解，用具体的形象来表达，化抽象为具体，形象地传达出尽管在时代的重压下，仍然拥有坚强跃动的心和奋斗不止的魂的进取精神。



图 6-1-2 黄苗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夜》 1934 年 11 月 20 日^①

▲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夜》（图 6-1-2）。这则漫画新闻发表在 1934

^① 图片转引自周立民、王晓东编：《漫画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1 页。

年 11 月 20 日的《漫画生活》第 3 期上。1914 年 7 月 28 日至 1918 年 11 月 11 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20 世纪 30 年代初，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创伤还记忆犹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兆又日益明显，当时不少报刊发表文章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何时到来。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学生的范长江，在 1933 年冬天就与朋友计划组织一个研究性的团体，“至于这个团体的名称，我们暂时定名‘一九三六’，因为那时许多外国报刊，纷纷估计第二次大战要在一九三六年爆发，有些文章的题目和书名就叫‘一九三六’。他们都同意我的意见，一面出启事，征求北大同学参加，一面把这个‘研究大纲’寄到北平《晨报》去发表了”^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到来的预言，使社会上一些人陷入异常恐慌之中，有的人开始囤积生活物品，有的人购买救生设备，有的人今朝有酒今朝醉。

这则漫画新闻报道了当时社会上千奇百怪“世界末日”般的种种表现：“悲观者拼命饮酒”“大都市烟雾重重”“享乐者大有借口”“打铁匠夜夜失眠”“军火商购制钱袋”“军校生赶速毕业”“传教师宣布末日”“政治家西斯迭里”。这里有真正的神经衰弱者，有趁势起哄制造疯狂盛宴者，也有浑水摸鱼借机发财者，更有幕后积极推动以遂其图者，各色人等都在社会的大舞台上卖力地表演。战争使人恐惧，但战争却是人类自己造的孽。作者如同一位清醒的观众观看这场人间喜剧，流露出悲悯、同情、冷嘲、热讽。

▲《儿童年之儿童问题》（图 6-1-3）。这则漫画新闻发表在 1935 年 4 月 20 日的《漫画生活》第 8 期上。前文曾述及，南京国民政府于 1934 年 3 月发出“训令”，1935 年 8 月 1 日至次年 7 月 31 日为儿童年，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儿童福祉的气氛，各种形式的活动和口号充斥上海街头。这些热闹的表面文章当时就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质疑，童漪珊的《儿童年！》对国民政府当局只注重形式主义、专做表面文章进行了批判。盛公木的《儿童年之儿童问题》，从另一个视角探讨了“儿童年”背后的问题。

^① 范长江：《我的自述》，见沈谱编：《范长江新闻文集》下，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173—117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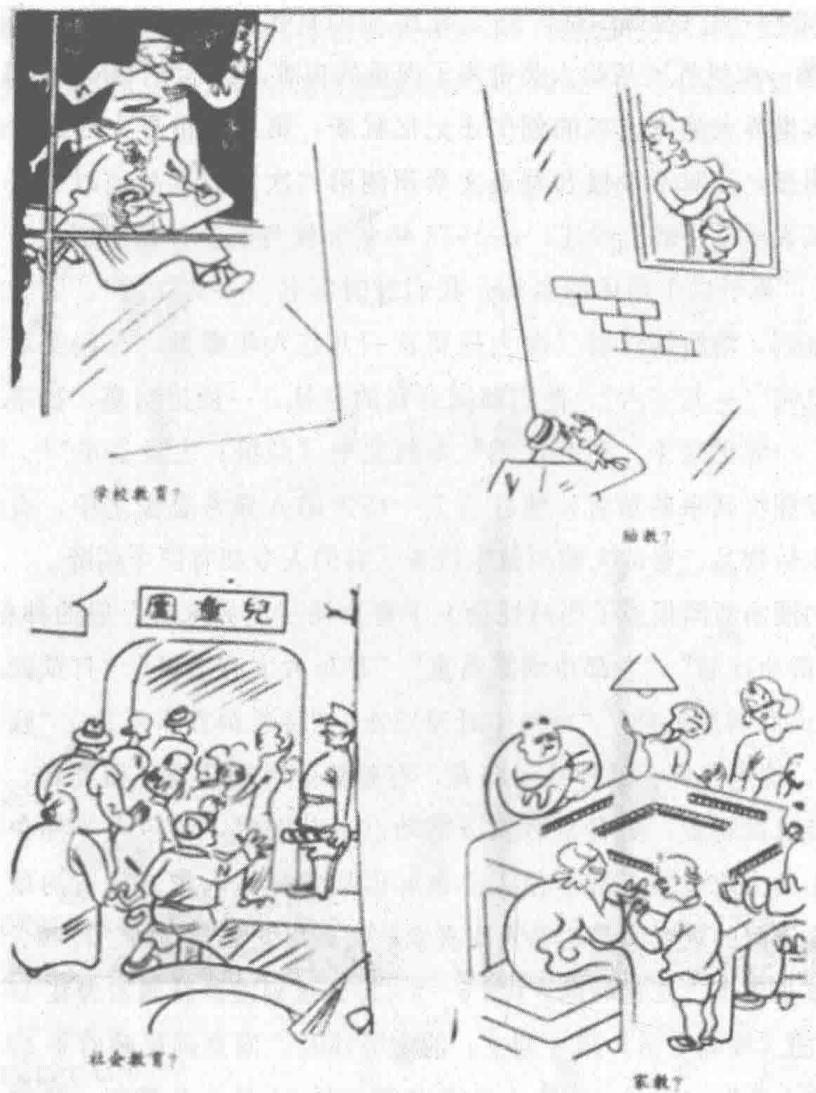


图 6-1-3 盛公木 《儿童年之儿童问题》—1935 年 4 月 20 日^①

人们认为社会的责任，就是教导、训练儿童，使他们成为健全的公民，而不是喊喊口号、贴贴标语。《儿童年之儿童问题》对当时社会儿童教育的

^① 图片转引自周立民、王晓东编：《漫画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9 页。

缺陷进行了暴露。画面上集纳了四种与儿童相关的畸形教育类型：怀孕女子与情人勾勾搭搭的胎教；父母亲打麻将儿童在旁观战的家教；灌输子曰、呜呼等陈旧知识的学校教育；大人带着儿童不守秩序蜂拥乱挤的社会教育。这些都是不良教育。对每种教育的实际形态及内容，漫画新闻作者都标上“？”，以质疑口气对所谓“儿童年”的虚浮与表面化进行否定，提醒人们真正关注儿童教育问题，不可等闲视之，更不可敷衍！



图 6-1-4 铁星 《五月之领土》 1935 年 5 月 20 日

▲《五月之领土》（图 6-1-4）。这则漫画新闻发表在 1935 年 5 月 20 日的《漫画生活》第 9 期上，以中国地图为背景展现其时的民族危机。在中国版图上，白色粗线将其约略分隔成四块，每一块都以时事照片拼贴覆盖其上，表明中国各区域正发生的典型事件。最大一块标明“CHINA”，表明这部分尚属中国，在这块土地上，人们正在进行反帝示威游行，从隐约可

见的“取消不平等条约”“抵制英国货”“××中学学生会”等标语中可知，这是当时席卷全国的学生示威游行。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学生在民族救亡运动中一直发挥着启动和先锋的作用，他们的率先呐喊与行动促进了中国广大民众的觉醒。漫画新闻中的中国东北角赫然写着“UNDER JAPANESE INFLUENCE”，表明日本对东北的占领及建立的伪满洲国统治。地图上中国的西南与北方，仿佛是两块沉默的土地，但这沉默并不是安全无恙的象征，恰恰表明其中正在孕育着暗暗脱离中国控制的因素，所以地图中作者使用两条粗大线条将之与“CHINA”隔离开来。地图上分隔中国领土的线条粗大显目，可以感受到作者在制图时的强烈情感，这些人为的分隔未得国人允许，是一种强加的不合理行为。在中国地图内粗暴分区，充分地表达了中国正遭受瓜分和蹂躏的信息。时事照片虽然只反映某一事件的片段，但它是一个过程的截面，可以给人联想整个事件的空间，将多幅照片并置，可以形成具有情节的信息。作者巧妙地把时事照片与地图拼贴起来，将空间概念自然而有效地转换成时间概念，形成一个开放而流动的话语叙述单元，足以警醒酣梦，激励人心。

▲《逃荒》（图6-1-5）。这则漫画新闻发表在1935年6月20日的《漫画生活》第10期上。1935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大灾年。1936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经济年报》曾这样概括1935年的中国灾害形势：

1931年的水灾是中国过去最大的水灾，1934年的旱灾是中国过去最大的旱灾，1935年则是把这两个最大的灾荒合流了，是年水、旱灾荒双管齐下，竟然把这过去的纪录都打破了。1935年入夏后，包括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在内的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酷热，亢旱异常，人们望雨甚殷。有的省份鉴于上年的教训，甚至已制定了《旱灾紧急救济办法》，要求各县遵照实行。不料6、7月之交，天气忽变，长江、黄河流域突降暴雨，正全力以赴从事抗旱的人们一下子措手不及。大约6月下旬以后，长江流域部分地区即开始大雨连绵。7月3日到7日，长江中上游的鄂西、湘西，汉水流域的陕南、豫南、鄂西北，锥刺刀扎般的瓢泼大雨整整下了5天5夜，兴山、五峰两县降雨量分别高达1084毫米和1281.8毫米。滔滔江、河水袭击了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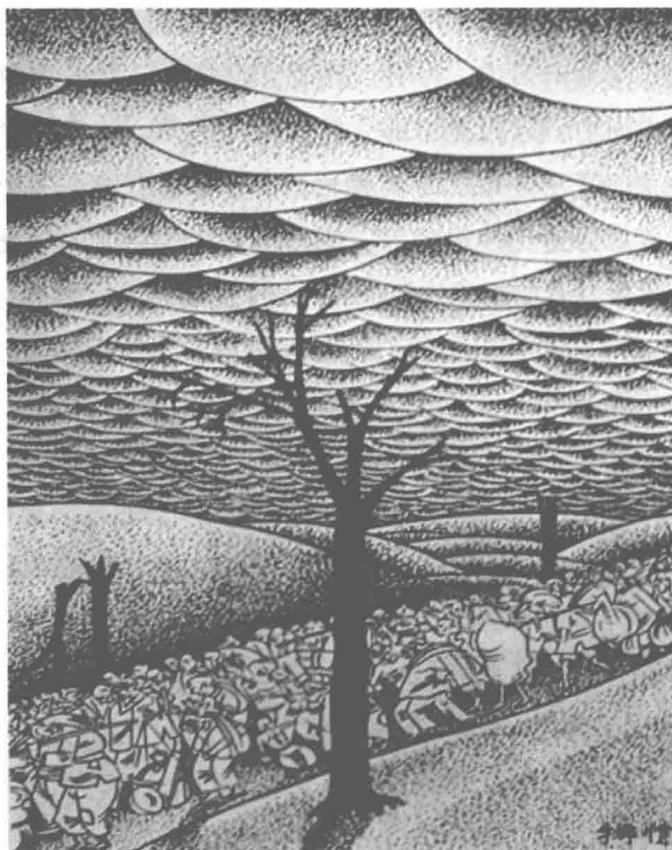


图 6-1-5 特伟 《逃荒》 1935 年 6 月 20 日

湘、皖、赣、豫、鲁、冀、苏 8 省 241 县，水淹面积 139109 平方公里，受灾民众将近 2200 万人。仅鄂、湘两省，至少有 14.2 万人在洪水中丧生。加上随之而来的风、雹、病、虫等灾，全年损失粮食在两亿市担左右。^①

《逃荒》这则漫画新闻报道了大批灾民背井弃乡、流离道路的凄惨景象。画面上几棵枯树皮净叶光，只剩下树干和枝杈，绝望地伸向天空，一棵树还拦腰断为两截，没有一丝生气。道路上挤满了拥挤的灾民，一个紧挨一个，如潮水一般流向没有尽头的远方，天空中浓云滚滚，如无边的沙漠，又似巨大无比的穹庐，覆头盖顶，压抑得人们喘不过气来。作者用三

^① 参见夏明方、康沛竹：《滔滔江河水——1935 年长江、黄河大水灾》，《中国减灾》2008 年第 3 期。

分之二的篇幅展示天空景象，而逃荒的人群被压缩成如沙子一般的微粒，仿佛完全失去了生命的活力，作者以此着意渲染大自然的肆虐疯狂和无边威力。在造物主面前，人们显得那么的渺小和无助。沙漠缺少生命所需要的水，一向是荒凉甚至是死亡的代名词。作者有意借助了木刻艺术表达中的肌理语言，着意营造出沙浪效果，使人们在体悟画面的过程中，感受版画肌理语言艺术所具有的视觉效果，展开相关情境的意义联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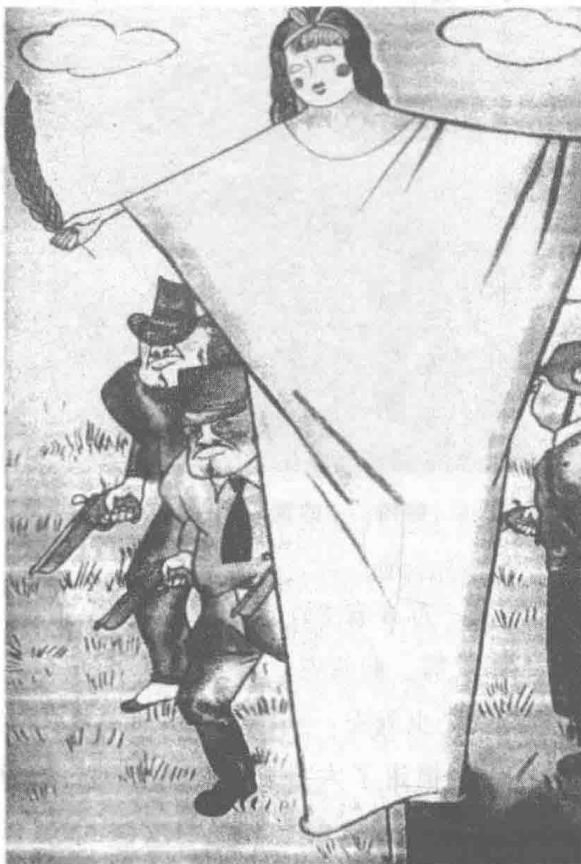


图 6-1-6 张谔 《和平招牌》 1935 年 7 月 20 日

▲《和平招牌》(图 6-1-6)。这则漫画新闻发表在 1935 年 7 月 20 日的《漫画生活》第 11 期上。马克思曾经说过，战争远比和平发达得早。人类酷爱和平，但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短暂的和平不过是漫长的战争

马拉松中的小小喘息和间歇。好战者在策划和制造战争时，往往利用世人爱好和平的善良愿望，打着和平幌子招摇撞骗，欺世盗名。战争恶魔希特勒就是这样。1933年初，希特勒甫一上台，便以和平的烟幕掩盖战争的阴谋。他训诫其党徒说：“口头上可以讲讲和平，内心里却要想着战争。”^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希特勒为了麻痹英美等国，迷惑人民，一再散布“和平”论调。希特勒要的和平把戏，使得西方一些国家对之深信不疑，英、美、法等国都逐渐丧失了对德国的警惕。例如，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就认定希特勒“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②。无独有偶，日本在疯狂侵略中国的时候，“和平”也是其常常高唱的调子。签订《塘沽协定》以后，日本斋藤内阁外相内田康哉突然宣扬“亲华”论调。1933年8月8日，日陆军省就关东军“撤回”长城一线发表声明称：此举“系对于中日提携与东洋永远之和平，踏入第一阶段”之明证，要求中国采取措施以，“一扫两国间不快之感情，互相提携”。^③ 1935年出版的《南岛》杂志发表的《中日亲善与中国民众》一文就一针见血指出：“他们说要和中国亲善，简直叫中国人一声不响地任她宰割。”^④ 日本嘴里高喊的“和平”，只不过是其欺骗和麻痹世界的烟幕罢了。《和平招牌》这则漫画新闻的画面上，在巨大的和平女神招牌后面，躲着几个拿着手枪的人，鬼鬼祟祟，其打着和平招牌干着侵略勾当的本质暴露无遗。

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上海相继创刊的近30种漫画期刊中，《漫画生活》月刊是进步倾向明显的一种。该刊不仅发表漫画、版画、漫画史论、漫画评论等，而且发表散文、随笔以及报告文学等作品，融艺术、文学、学术于一体。该刊紧密关注时局，观察视角广阔，针砭时弊，宣扬正义，

^① 陈显泗、郭建斌：《希特勒是怎样在“缓和”的烟幕下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史哲》1977年第3期。

^② 转引自〔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1卷《风云紧急》上部第2册，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446页。

^③ 转引自张篷舟主编：《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1932—1982》第1卷，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页。

^④ 转引自焦润明、焦婕：《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朝野对“中日亲善”言论的反应》，《史学月刊》2017年第9期。

锐意改革社会陈腐，推动历史前进，是一本可读性强、启人深思、品位高尚的刊物。该刊编辑黄士英、黄鼎、张谔是当时活跃的进步漫画家，其中张谔已是中共地下党员，更重要的是，该刊得到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的漫画家蔡若虹、特伟、陆志庠等的全力支持，以及茅盾、巴金、老舍、靳以、胡愈之、郑振铎、蹇先艾、陈荒煤、王统照、张天翼、黎烈文、曹聚仁等一大批左翼文学家的大力襄助，所以稿源丰富，编得有声有色。^①对于这样的刊物，鲁迅先生不仅喜欢，亦乐意为之供稿，他不仅为该刊撰写了《说面子》《弄堂生意古今谈》《阿金》等3篇文章^②，而且还收藏了整套的《漫画生活》，并在1935年3月另购两期《漫画生活》，寄给日本友人增田涉。他在给增田涉的信中说：“《漫画生活》则是大受压迫的杂志。上海除了色情漫画之外，还有这种东西，作为样本呈阅。”^③显然，这样一份宣扬主义，艺、文均为上乘的漫画刊物，无法为国民政府当局所容，故而该刊在1935年9月20日出至第13期时，即被国民党中央宣部明令查禁。

第二节 《电影·漫画》的漫画新闻

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众多漫画刊物中，以电影为主要报道内容的主题漫画杂志颇为流行，也颇受读者欢迎与喜爱。在1934、1935年，上海一地就相继问世了两本刊名相近的主题漫画刊物。1934年6月，漫画家张白鹭主编的《电影漫画》由上海电影漫画社出版发行，仅出两期即告停刊。1935年4月15日，20世纪30年代漫画界主力作者之一朱金楼和顾逢昌创办了《电影·漫画》，最初由上海漫庐图书公司出版，上海杂志社总代售，从第5期起改由上海漫画社出版发行。1935年9月停刊，共出版6期。朱金楼、顾逢昌、陈家枢、夏明羲和竺继忠先后担任编辑，鲁少飞、胡考、

^① 黄可：《鲁迅何以会收藏整套〈漫画生活〉》，《东方早报》2013年12月15日。

^② 鲁迅在《漫画生活》上仅发表了《弄堂生意古今谈》《说面子》两篇文章，《阿金》原来也是为该刊撰写的稿件，但在当局审查时被抽掉了，后收入《且介亭杂文》。

^③ 转引自上海图书馆编：《老上海漫画图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3页。

万籁鸣、张英超、丁聪、黄尧等众多漫画名家都在该刊上发表画作。该刊刊登一些电影明星漫画肖像引人注目，而且很多时事漫画新闻在反映生活的广度和力度方面，也颇为独到。



图 6-2-1 陈家枢 《文化侵略的假面具》 1935 年 4 月 15 日

▲《文化侵略的假面具》(图 6-2-1)。这则漫画新闻发表在 1935 年 4 月 15 日的《电影·漫画》第 1 期上。马克思在 1843 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压制殖民地的工具。近代史上，洋毒药（鸦片）、洋枪炮、洋宗教，是列强侵华的三大工具。鸦片战争后，西方宗教势力仗列强的大炮和不平等

条约的保护，迅速在中国各地渗透、膨胀、蔓延。到 19 世纪末，在我国的外国传教士已达 3300 多人，仅直隶、山东、山西与河南四省，属于天主教的大小会堂、教堂有 4000 多处；基督教各差会在华设立的总堂也约有 500 处；入会教徒达百万余人。深入中国内地的教堂几遍天下、无处无之，虽穷乡僻壤，亦有各国教士潜往传教，形成了列强侵华的密布的神经网络。在近代列强侵华的过程中，一些传教士们秉承本国政府的意志，充当侵略中国的工具。信教自由的名义下隐藏的是杀戮和掠夺。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①

《文化侵略的假面具》的画面是一处写着“上海济良所”字样的房子，房子墙壁上又挂着一块写着“耶稣能救人”字样的牌子。所谓“济良所”，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一种慈善机构，专门收容救济被拐骗、受虐待而无处可以投奔依靠的妇女。这些“济良所”多有宗教背景。帝国主义列强的这种“慈善”行为当时获得很多人的好感，被称赞为一种救世行为，但也有一些人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剖析这种行为的深层性质，认为这是一种与西方侵略活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旨在俘获人心的行为，是配合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施行的政治和经济侵略的一种文化侵略行为。

作者在标题后面还专门注出这是“牛庄路所见”。上海市的马路，大都以中国的省名或者市县名命名，但牛庄路的命名却不然。牛庄原是位于辽宁省海城县西部的一个小海湾名。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向列强增加开放口岸，列强急于打开中国市场，强迫清廷同意划出牛庄至营口的海湾作为洋船停泊之地。租界当局为庆祝牛庄开放，就将这条位于市中心的马路命名为牛庄路。实际上牛庄不过是一片沙滩地，根本不可能停泊船只，所以真正的牛庄在条约签订后就被列强“遗忘”了。^②但上海牛庄路的存在，留下了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印记。作者的注文使这种文化侵略的性质由于增加了历史元素而更显豁。

^① 《列宁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20 页。

^② 周林：《叩街问巷：上海马路的前世今生》，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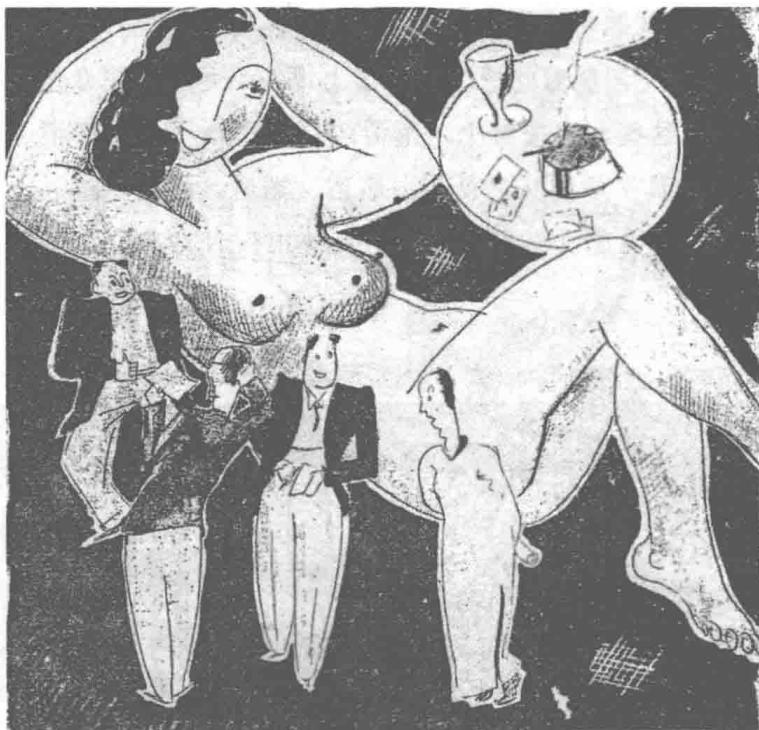


图 6-2-2 顾逢昌 《在女人身上找题材的作家》 1935 年 4 月 15 日

▲《在女人身上找题材的作家》（图 6-2-2）。这则漫画新闻发表在 1935 年 4 月 15 日的《电影·漫画》第 1 期上。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一股颓废和色情的潜流。20 世纪初叶发端于上海的鸳鸯蝴蝶派，是十里洋场的一个颇为有名的文学流派。他们最初热衷的题材是言情小说，写才子和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①。并因此得名“鸳鸯蝴蝶派”，以此流派为代表，当时文坛上存在着一种“没有生活经验，思想不成熟，不抓取对于人生有重大意义的题材，而老是搔首弄姿似的写些水兵和舞女的恋爱，或者马戏场里一个姑娘的罗曼司”^② 的文学写作倾向，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确有引导读者逃避现实的某种精神麻醉作用。

^①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见《鲁迅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94 页。

^② 茅盾：《再多些》，《文学》第 3 卷第 6 期，1934 年 12 月 1 日。